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古籍鈐記選萃



居蜜、梁紹傑、王粹人、楊文信：《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鈐記選萃》（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一套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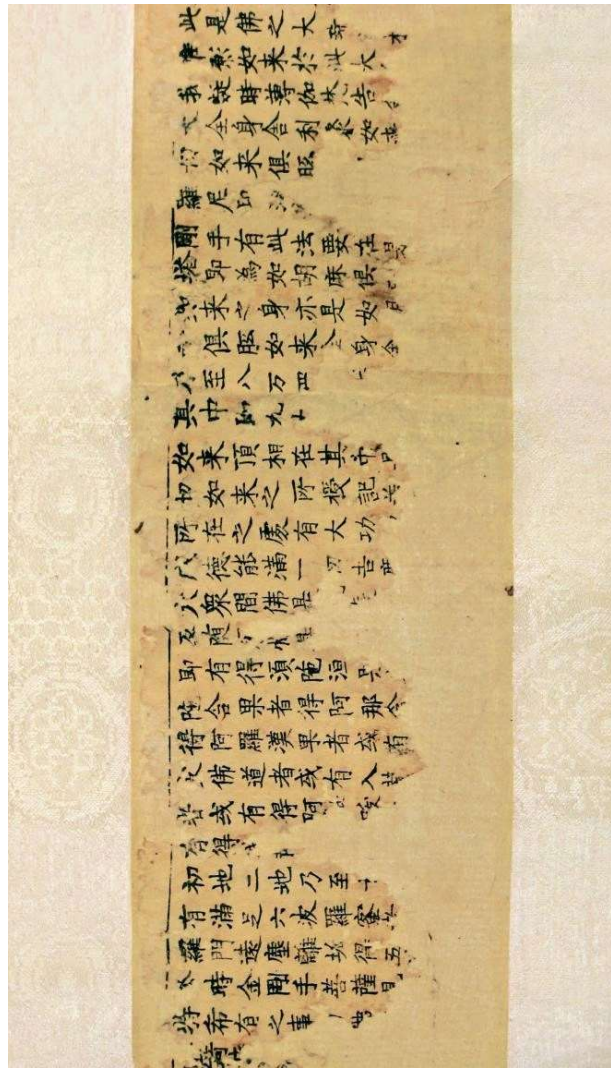
電子科技把世界縮小成爲地球村以後，人類生活的許多領域都起了變化，甚至全面改造，學術生活也不例外。把珍貴古書、繡像圖版、藏章印記複製，便是利用尖端科技的成果。沒有先進的電子科技，要在中國以高水準製作來重印收藏於美國華盛頓的稀世文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珍貴版本需要謹慎保存，依據美國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A.）有關善本書的規定，外借、複印均不允許，館內閱覽亦有嚴格規條。這些限制，都通過資訊科技得以突破。美國國會圖書館創辦於1800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館藏總數超過一億六千萬件，每天平均新增七千件不同類型的文獻資料。國會圖書館以保存全人類的知識爲目標，致力於建立一個包羅世界各國、各地文明和知識精華的館藏。因此，館內所藏英文書刊固然無與倫比，但同時也着力搜羅外語書刊，非英文類別占總藏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中文、日文、韓文、俄文、波蘭文等語種的藏書，成爲這些國家以外單一圖書館中藏量最多的。中文藏書方面，第八任館長普特南（Herbert Putnam,

1899—1939)銳意要在館內建立西方國家中規模最大、選書最精的中文書藏，并為此做出相應的採購安排，貢獻尤大。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史可以追溯到同治八年(1869)。同治六年(1867)，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際書籍交換法案，清政府於翌年收到美國政府贈送的圖書，乃以清穆宗(愛新覺羅·載淳，1856—1875，1861—1875年在位)名義選書十種以作回贈，自此開啟了中美雙方文化外交的具體合作。爾後，美國駐中國的外交使節、傳教士、漢學家以至各界人士陸續展開對中國古籍善本的搜集工作，歷年所得，數量龐大且不乏罕見孤本，而該批善本古籍也見證了過去百餘年來千絲萬縷之中美外交文化史。

回顧上兩世紀國會圖書館中文藏書的發展史，自民國改元後數十年間，中國國步維艱，無力顧及鄉邦文獻。國會圖書館悉力搜羅，對於中文典籍的保存居功至偉。若要了解館中所藏珍罕秘籍，收書者本身的師承、學術造詣、語言駕馭、社交網絡及採購因緣際會均須注意。但因書在中秘，一般來館學者往往只找個人研究所用書籍，未必熟知館藏其他珍品。著者有一共同心願，將館藏介紹於世人，使學界同人能按書索驥，共用珍藏。

如今資訊科技發展到萬里咫尺、全球一家的階段，“收藏非要，能用至要”(accessi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wnership)的原則已經得到普遍認同。2005年，國會圖書館展開中文善本數字化項目，由於善本書納入館後限制嚴格，地處遙遠，乏人知曉，書少被翻動，書品均甚好。經高解析度掃描後，影像效果可媲美原書。部分電子影像在“促進國際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增加互聯網上文化內容的數量和種類；為教育工作者、學者和普通觀眾提供資源”的宗旨下，由國會圖書館提供予世界數字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更大規模的全書存真展現工作，將更能看出收藏意義、學術價值和文化推動的相互關係。有關這一點，不妨從鎮館之寶之一、吳越王錢俶(929—988)刻於北宋開寶八年(975)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以下簡稱《心經》)殘卷談起。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

此佛經長卷全長6呎，寬2.5吋，存250行，1936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得，為館中最早的中國雕版印刷藏品（圖像參本書《書影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年度報告書，為每年截至6月30日為止上一財政年度的館務與館藏情況作綜合介紹，1936年度報告書（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36）提及此《心經》原為浙江省長夏超（1882—1926）所有，後由一“美國公民”（American citizen）獲得，卷中有當代著名書法家談國桓（1875—？）題語，乃應東北少帥張學良（1901—2001）之請而書。按《心經》卷首談氏所題如下：

“此《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也。宋時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久供養，即雷峰塔所藏者是也。塔傾經現，敬閱一過，福緣不淺。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歲次

乙丑，十二月十五日，談國桓爲藍爾生先生題。”

文末鈐“談國桓印”及“鐵隍”二印，署“乙丑年十二月十五日”即1926年1月28日。此段文字，王重民（1903—1975）《中國善本書提要》亦有引錄，但於“藍爾”後漏去“生”字。談國桓其時遠在東北，長期擔任張作霖（1875—1928）重要幕僚，何以爲此卷作題識？藍爾生究爲何人？凡此，《心經》卷中并無綫索。本書策劃人及著者之一居蜜從國會圖書館手稿部（Manuscript Division）所藏恒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 Sr., 1884—1975）檔案發現兩份文件，以之與《心經》題識、鈐印相對照，始得知此經卷的發現、評鑑與購藏的來龍去脉。

前述的“美國公民”實指藍爾生（Emanuel S. Larsen, 1892—1963），亦即售《心經》殘卷予國會圖書館的人。1935年12月28日，藍爾生致函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欲以美金250元出售此經，并述得經始末如下：1924年9月25日，孫傳芳（1885—1935）所部進占杭州，適雷峰塔坍塌，塔圯而磚石間所藏不同刻本的《心經》現出。惟經卷因久歷時年，卷頁粘連，無法展閱。夏超以佛經浸入混合茶葉的稀漿之法，成功修復約七部，《心經》殘卷即其一。這批經卷當時存放於當地博物館，至翌年10月運送至瀋陽（筆者按：可能是怕孫傳芳部隊盜走）。夏超爲感謝藍爾生提供卡車（或做運送經卷等物之用），遂以此殘卷相贈，而少帥張學良復請其父之佛師及名書法家談國桓題款。藍爾生得此卷後，俄國漢學家鋼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曾作鑑定，充分肯定其具早期巴利（Pali）文音譯的特殊價值。1934年8月，美國漢學家羅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有意購入此中國早期雕版印刷珍品，不巧於是年過世，此經未淪爲私藏。

1935年12月31日，恒慕義爲購買此殘卷《心經》，向館方提交備忘錄，補充了有關此經被發現的一些細節，如雷峰塔之倒塌在9月25日下午約二時半；夏超贈此殘卷予藍爾生，乃酬謝其代爲購買卡車，而藍爾生是美國海軍中譯官。恒慕義延請長期爲該館採購東亞圖書及文物的美國政府農業部專家施永格（或譯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 1891—1952）再作鑑定，亦同意此爲珍品，并全力支持恒氏購藏的建議。最後，恒慕義的建議經館長簽字批准。備忘錄還提到此殘經中有杭州藝術家彩繪一幅，但没有具名。今展閱此卷，即可知作畫者爲西泠印社社員、兼擅詩詞、書畫、篆刻的名家樓辛壺（名邨，1881—1950），畫題作《雷峰夕照圖》，落款“甲子（1924）冬日辛壺寫影”，鈐“辛壺”鈐印。十餘年前，任光亮、沈津曾撰文介紹國內外所藏各種《心經》，言及上海圖書館及臺灣“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本均有“樓村”繪畫、題識及鈐印，據該文所引錄，知兩館所藏者，其畫作及題識均與國會圖書館藏本有異。國會圖書館藏本樓氏畫作於“甲子冬日”，早於作於“乙丑仲夏”的“中央圖書館”藏本。或者雷峰塔倒塌及《心經》的發現，引起各界注意，故樓氏畫作一再繪於各卷《心經》之上。

美金250元於1935年爲何等價錢，可以從中國近代著名藏書家傅增湘（1872—1949）的售書提要中得到佐證。1941年，傅氏將所藏五種宋版善本售予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價如下：宋刊大字本《魏書》，美金800元；宋刊大字本《後漢書》，美金200元；宋刊本《東坡紀年錄》，美金50元；宋刊本《分門集註杜工部詩》殘本，美金30元；北宋刊本《妙法蓮華經》，美金120元。宋刊本《心經》售價倍於《妙法蓮華經》，其價值之高於此可見。居蜜得悉《心經》殘卷的入藏始末，由是興起策劃彙整館藏漢籍之念，遂展開爲期十二年之文化大工程。本書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首舉有樓辛壺寫雷峰塔畫像的《心經》殘卷，其特殊意義自不待言。

百家註東坡先生詩序

西蜀趙公

夔

堯卿撰

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書時人謂
征南祕書爲丘明孟堅忠臣又李善於梁宋之
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
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
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
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况堂奧乎然僕自幼歲
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
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旣窮山
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



北宋刊本《妙法蓮華經》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數量龐大的珍本古籍有一特點，往往多具收藏家的印章。古籍研究者對藏書印都很重視，明清時代中、日、韓三國的古籍收藏家和當時政治、文學藝術的關係都很密切。印章是信物、藝術品和歷史文獻，書畫家在作品上蓋章，收藏家、鑑賞家在名家書畫、善本書籍、金石拓片上鈐印，有表徵身份之意，因而印章圖記為後人鑑定古書提供重要綫索。研究中國藝術的歷史，這是很大的便利，且延伸成為今日“鑑偽”的有力依據。同一位書畫家一生中可以有數十甚至上百枚印章，不同時期使用的印章也會有差別。書畫家、收藏家、鑑賞家用印有其個別習慣，印色也不盡相同。有時印章有殘缺、磨損，前後期作品即使蓋上相同印章，效果也會不同。作偽者只要有一處疏失，就會留下證據。善本書籍上的印記，作偽相對較少，正可作為書畫印鑑的輔助。在進入電腦數據化的年代，收藏印記又可作為復原書籍流傳的引綫，進而成為歷史研究的旁證。廣義來說，所有加諸書籍上的“印記”、“眉批”都是讀書人留下的重要痕迹，無論在史、在藝，我們作為後人都應珍惜、善加利用。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沒有做好，是一個有待好好開發的領域。

古籍上的鈐印，除了一些屬於出版者的印記，絕大部分是由曾經歸屬的機構或個人蓋上去的。這些藏印，是我們賴以追溯古書遞藏流傳的重要綫索。此外，一些年

代不明的寫本或刻本，有時也得憑借裡面的藏記，才可以約略推知其年代。上海圖書館藏孫原湘（1760—1829）天真閣鈔本吳炎（1624—1663）、潘耒章（1626—1663）《今樂府》，末有墨描“秀水陸氏鬱林山館所藏之印”陽文方印，當由祖本過錄。憑此墨描印記，可知此鈔本所據原本為陸鏞（？—1859）家藏。陸鏞叔父陸筠（1755—約1835）僑寓秀水，以勤於鈔書及校勘著聲，錢泰吉（1791—1863）稱其“所藏書，皆校勘精審。得一善本，丹黃不倦”；又記陸筠下世後，陸鏞能守其所遺。則天真閣鈔本吳、潘《今樂府》的祖本，極可能是陸筠據秀水舊家所藏本手錄，淵源有自，是目前通行的《殷禮在斯堂叢書本》及繆荃孫（1844—1919）校鈔本之外的另一重要版本。而此鈔本的文獻價值，則全賴一方摹畫的印記，才可以確定。由此可見，藏書印不光可作篆刻鑑賞，還有重大的文獻價值，理應被看作古籍的重要信息給記錄下來，可事實并非如此。

清代以前編撰的解題書目，未見有對藏記作系統記錄。清初錢曾（1629—1701）撰《讀書敏求記》，記錄所藏善本，解題精審，尤詳版本及授受源流，向被奉為目錄之經典，惜於所藏珍籍上的藏記記述寥寥，僅於李龔（1194—1292）編《唐僧弘秀集》、張世南《游宦紀聞》、陸友仁（1290—1338）《硯北雜誌》及對宋本校寫本《白氏文集》數種解題，略為提及。

藏記著錄，當以乾隆四十年（1775）編修的《天祿琳琅書目》為里程碑。登錄於這部書目的古籍，“每書各有解題，詳其鈔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并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又“其印記則仿《清河書畫舫》之例，皆用真書摹入，以資考據”。此書著錄藏印，既摹刻其形狀、釋讀印文，更開示印章所在卷次。如卷一著錄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點校毛詩》二函十冊，解題末尾開列藏印：“宋本”橢圓印、“季振宜印”方印、“滄葦”橫印、“崑山徐氏家藏”長方印（以上俱朱文），“愴園”白文橫印、“健庵真賞”朱文方印（以上俱見卷首《毛詩圖譜》），“季振宜讀書”長方朱文印（卷一、卷四、卷九、卷十三、卷十六、卷十九），“應召”白文橫印（卷四），“應召珍藏”朱文方印（卷十六、卷十九），“季應召印”朱文橫方印（卷十三），體例可謂詳慎。惟此書於印主考訂，未免疏略，對著名藏書家孫七政（1528—1600）、高濂（1573—1620）、王聞遠（1663—1741）和名重江南的書估錢時霽（1732？—1802）的印章，竟然都失考。



蓮涇

(朱方 1.4 厘米 × 1.4 厘米) [書影 196.4]



太原叔子藏書記

(白長方 2.3 厘米 × 1.5 厘米) [書影 196.4]

王聞遠

藏印



白堤錢聽默經眼 (朱長方 1.8 厘米 × 1.4 厘米) [書影 170] 錢時霽藏印

乾隆末年以還所出解題目錄，多詳記藏印，以示流傳有緒，分藏各家的古籍藏記信息始得以流通，便利學者取資考證。二十世紀以還，更有記錄或論述藏書印譜的專著陸續刊布。這些藏書印譜，一般只提供藏印圖鑑、釋文及印主簡介，且偏重於著名藏書家及學者的印記，固便於賞鑑參照，但對於發掘藏記的文獻價值，似仍有未盡。

編錄藏印，為充分發揮其文獻功能，應兼顧以下五項：一、提供藏記影像，以便參考者可以作直接觀察；二、釋讀印文，以便參考者掌握其內容；三、考訂印主，以便參考者了解流傳梗概；四、提供鈐印書影，以便參考者作進一步探索；五、提供量度數據，以便比較參照。要滿足這五項信息要求，就必須由原書着手，仔細翻閱，詳細記錄，廣稽文獻，方可見功。也只有這樣，才可以在記錄古籍藏記的同時，對一些鮮見著錄或印主不詳的鈐印，作進一步的考索。按這種要求整理藏印，除了要具備查閱大量古籍的客觀條件，前期記錄和後續研究也相當耗費時間和精力。據沈津記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他曾參與上海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前期準備工作，在審核館藏善本時，曾製訂表格，記錄藏章，并按原樣大小拍攝照片，以便日後編纂《明清藏書家印鑑》¹⁵，并累積圖錄稿數本，可惜日久散佚，終未成事。可見要認真編集藏書印，工作十分艱鉅。晚近陳先行與石菲合著《明清稿鈔校本鑑定》¹⁶，書內《明末清代校勘家之印章墨迹》一章，載校勘家小

傳，附印章、釋文及書影。所載印章，均由原書拍攝，且按原大排版。¹⁷ 雖以珍罕稿鈔校本為範圍，收錄數量有限，仍極具參考價值。又北京國家圖書館文瀾分館普通古籍部編纂《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¹⁸，洋洋十鉅冊，沒有稽閱館藏的特殊條件，恐怕難以辦到。¹⁹

隨着電腦和通訊科技的發展，根據出版流通的文獻，整合藏書印資料，以便查考，已經較前方便。²⁰ 當前急務，是將各收藏單位的古籍藏印原始資料發掘出來，并提供較完整的信息。²¹ 我們合作編寫這部藏印圖錄，便是朝着這個方向的

の藏書印》（京都：藝文社，1954）及相島宏編著：《中國藏書印提要：印文篇》（武藏村山：青裳堂書店，2006）等藏書印專著，以日人藏印為主。至於中國藏書印鑑專著，則有林申請：《明清藏書家印鑑》（上海：上海書店，1989）、《中國藏書家印鑑》（上海：上海書店，1997）。

- 沈津：《藏書家印鑑》（2013-03-18），見沈津“書叢老蠹魚的博客”該文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15bol.html）
- 陳先行、石菲著：《明清稿鈔校本鑑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此書所錄印章圖像，編者雖未說明一依原印大小，但經本書著者以所量度的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古籍藏章數據，對比其中相同鈐記，尺寸相約，知按印章原大製圖。
- 孫學雷主編：《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北京：綫裝書局，2004）。
- 此書收錄藏記數量甚夥，可惜只有釋文，印主考訂闕如，且錯漏不少，未盡發揮館藏印記的文獻功能。參沈津《讀國圖編〈藏書印選編〉》諸文，茲據作者2007年10月2日至10月5日先後發表於“書叢老蠹魚的博客”的五篇文章。
- 如浙江圖書館自2011年起建構的“中國歷代人物印鑑數據庫”（<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zgjcj/index1.htm>），可按人物姓名、字號、室名檢索印鑑，并提供印主肖像、簡介、印鑑圖形、釋文及資料出處。又臺北大學古典文獻所建構的“古籍資料檢索系統”（<http://www.cbtc2.ntpu.edu.tw/list.php>），收納119部書誌提供的古籍信息，提供包括“藏印”、“藏書流傳”的多項欄位檢索。
- 青裳堂書店，1965）；朝倉治彥解說：《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印譜》（京都：臨川書店，1985）；內閣文庫編：《（改訂增補）內閣文庫藏書印譜》（東京：國立公文書館，1981）；丸山季夫著：《靜嘉堂文庫藏書印譜》（武藏村山：青裳堂書店，1982）；宮內廳書陵部編：《書陵部藏書印譜》上下（東京：宮內廳書陵部，1996—1997）

本書由醞釀、構思以至最終落實編寫出版，歷時約十二年，亦承種種因緣條件配合。首先，居蜜服務美國國會圖書館三十五年，先後出任亞洲部學術科主任、署理主任，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室“世界數字圖書館”專案項目中文珍本庫主任，對館內的中文古籍收藏瞭如指掌，且一直積極推動開放中文古籍收藏資源，以便學術研究。在她的指引和組織下，才有條件進行這部書的前期資料搜集。本書另一著者王純傑，為當代著名書畫家王景陽先生哲嗣，幼承庭訓，工書善畫，及肄業上庠，復從中國臺灣篆刻名宿游，深諳鑄藝。國會圖書館中文古籍藏記之蒐集、記錄及釋

讀，悉賴其勞。梁紹傑和楊文信長期專注於明清時期學術、文化、歷史等方面，故專責稽考印章主人，并簡述藏主的生平、學問、交友、著作、藏印的特點，藏書機構的沿革、收書情況、藏印與藏書的關係等，俾便鈐印一書與史學結合，以印證人、證書、證史、證文化交流，嘉惠學界和全球讀者。

我國自古利用“印記”把抽象的“信用”觀念轉換成具象，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秦（前221—前206）、漢（前206—公元220）兩朝是篆刻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元末王冕（1287—1359）發現花乳印材，形成明清流派的第二次高峰。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批收藏印面，對明朝以來中、日、韓三國的印貌提供了寶貴實物。方寸之間有太多的訊息，我們很幸運可以用現代科技做有系統的整理，去探索古人印章的含義及史迹，見證蘊涵中華文化底蘊的善本古籍之巧奪天工。

大人文研藏書印譜》（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センター，2008）；矢木毅編：《京大人文研藏書印譜》2（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學研究センター，2016）。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建立的“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將館藏古籍、拓片上的鈐記作系統著錄，不僅兼括前述影像、釋讀、書影、量度及印主五項，還記錄書體、刻法及查考篆刻者；不僅將館藏古籍、拓本的藏章整理流通，更兼顧文獻、藝術兩方面的信息，可以看作整理藏記文獻的範式，供其他收藏中國古籍的機構借鏡。傅圖藏印資料庫的建構體例及特色，可參考楊果霖：《“傅斯年圖書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評述》，載《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6期（2014年9月），頁1—28。楊文亦指出傅圖藏印資料庫的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涉及數據增補緩慢及藏，印考訂缺失，反映了編集藏書印資料工作的艱鉅。